

跨界與融合

——2016年澳門文學發展新動向*

趙 哲

[摘要] 縱覽2016年澳門文學創作及研究的發展情況，不難發現澳門文學的概念正呈向外不斷延展的態勢，從而使澳門文學始終保持生長力，形成了創作和研究雙向的新角度。無論是從澳門文學到澳門學的跨學科研究視點，還是從“本土—殖民—國族”的對立性到跨文化立足點，抑或是從文學與載體的融合關係上來看，均顯示出澳門文學日益豐滿的新姿態。

[關鍵詞] 澳門 文學 跨學科 文化間性 媒介融合

一、從多元混融到學科の間際整合

近來，研究者進一步關注澳門文學的生存語境，而這種關注是在跨學科思維的背景下展開的。跨學科思維與澳門文學的鏈接行爲，不僅深化了以往澳門文學多元化的研究，同時也讓澳門文學進入研究者的視野時，更具整體性和層次感。2015年底，澳門大學中文系主任朱壽桐就反覆強調澳門文學與澳門學之間的關係，他指出，“澳門學”作為一門獨立的學問，在逐漸產生影響力的情況下，不僅針對澳門歷史這一方面作出研究，也不單是澳門的歷史、政治、社會、經濟等方面的集合研究，而“是關於澳門的全部學術的總和”。澳門學涵蓋澳門文化、藝術、文學等諸多綜合領域，同時，這些領域也是建構澳門學整體結構的骨骼，“是澳門學學術構成中的題中應有之義”，^①而其中，澳門文學對於澳門學的學術構成，則是異常重要的部分。與此同時，朱壽桐分別從澳門的文化特色、文學生態和話語空間三個方面闡述澳門文學對於漢語新文學、中國文學史結構以及社會歷史的意義。朱壽桐的觀點明顯是建立在打通學科之間壁壘的開放型學術視野基礎之上，並將澳門文學置於歷史學、社會學、語言學等多種學科の間際整合之中，具有顯著的跨學科意識。因此，澳門文學、澳門文化乃至澳門學本身的跨學科研究，不僅豐富了澳門學的

作者簡介：趙哲，徐州工程學院人文學院講師、文學博士。徐州 221018

* 本文係徐州工程學院2016年度校級科研項目（編號：XKY2016204）的階段性成果。

① 朱壽桐：《從澳門學到澳門文學》，《光明日報》（北京）2015年12月21日第13版。

內涵，還對澳門文學的外延作出具有系統視角的延伸，顯示出當下澳門文學研究的整體趨勢。

回到歷史場景中去挖掘現場價值，是目前澳門學研究的一種被普遍認同的方式，但是，想要回到真實的歷史場域中，需要澳門文學的一臂之力。通過還原澳門文學的基本生態，從文學及相關史料中得到獨特的歷史文化記憶，可為其提供確鑿的歷史依據。如此看來，將文學研究置於澳門研究的整體視野中，是必然也是必要的。吳志良明確提出建構澳門本土知識體系的必要性，他認為澳門學研究已經有了一個明顯的轉向，即從以往對中葡關係的集中考察結果中探究澳門的地位和作用，描述澳門的歷史及文化發展過程，以及為澳門特區政府的執政策略，為澳門社會的發展和人文建設提供理論支持，“逐漸轉向在全球視野下回歸澳門社會、歷史、文化的本質，重新發現澳門的人文意義和普遍價值，構建澳門本土知識的理論體系、解釋體系和話語體系”。他不僅強調澳門主體性的價值體系建構，更着重清理作為一個主體的研究對象之內部的社會、歷史及文化之間的有機關聯。其中，“以澳門史研究話語權的回歸為標誌，以澳門自身為主體的研究取向漸趨凸顯”，並注意到了研究結果在研究視野、資料史觀、論點論據、研究成果、人才資源等諸多方面呈現出的“由外及內、由表及裏的”變革，澳門文學乃至澳門學在研究主體、研究主題、研究意識、研究方法及學術規範等一系列因素上日益呈現出以本土化為基準，“歷史知識的取得從過去由境外學者主導轉為由本土學者主導，研究主體轉向內部社會規律的演進”。在此基礎上，他還指出今後的研究目標——“明確澳門學研究對象的主體性，構建澳門學研究的話語體系，建立澳門學的解釋體系”，進一步展現出立足本土，將澳門本身視為主體的本土性意識，並注重主體內部要素的有機互聯。^①二位學者的觀點，不無印證了當下研究的新趨勢，即將“多元化”現象進行系統整合，走出學科間的困囿。

二、從簡單並置到文化間際的有機互聯

“澳門學本土話語體系的整合與構建，不僅對於豐富澳門本土知識和理論具有重要的意義，對於豐富全球人類文明史、推進區域秩序穩定和社會治理也具有重要的啓示”，^②這樣的觀點已經充分預示着澳門研究，尤其是澳門文學及文化研究的新風向——關注本體，從文化的特性描述走向文化間性的有機整合。“文化間性”（inter-culturality）在德國哲學家哈貝馬斯（Jürgen Habermas）的交往行為理論的基礎上發展而來。聯合國教科及文化組織大會認為“不同文化的存在與平等互動，以及通過對話和相互尊重產生共同文化表現形式的可能性”，^③便是文化間性的實質。作為21世紀全球化與本土化雙向互動的必然結果，文化間性理論展現了新世紀異質文化與不同人員在加速互動下所面臨的文化碰撞，表現為間性理論在文化領域具體形式的展現。無論是內地還是本地，越來越多的澳門文學研究者將澳門文化視為獨立的主體，而並非將殖民與本土

^① 吳志良：《全球視野下澳門本土學術話語體系的構建與闡釋》，《澳門研究》（澳門）2016年第4期。

^② 吳志良：《全球視野下澳門本土學術話語體系的構建與闡釋》，《澳門研究》（澳門）2016年第4期。

^③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保護和促進文化表現形式多樣性公約》，2005年10月20日，聯合國教育、科學及文化組織第三十三屆會議。參見中國人大網2007年公報，http://www.npc.gov.cn/wxzl/gongbao/2007-02/01/content_5357668.htm。

簡單並置，或者以泛“多元化”的論述用作萬能理論，這種趨勢不僅體現在本土作者的創作中，在各類研究者的視點中，甚至逐步擴展至澳門文化的研究中來。例如，澳門藝術節與冠以“國際”二字的“澳門國際音樂節”相比，明顯有了本土的自主性意識，其有意將本土為主、外來為次的理念貫穿其中，在本身仍具國際化的慣性之下，本土與外來作品在合作的機制中互相借鑑。雖然取材、審美之中仍保持着國際化的影子，但是這種趨勢已呈逐漸壯大的勢態。

周小蘭認為，澳門文學尤其是20世紀80、90年代的澳門小說中，有一個明顯的標誌，就是在澳門葡萄牙政府殖民的四百多年歷史背景下的以流浪敘述為主的“過客文學”，該時期出現在澳門的文學作品，主要是一種“植入”，而非“根生”，尤其關注土生葡人作家身體和精神上的雙重流浪；並認為，從“過客文學”到“難民文學”，“澳門小說家一直沿着中國傳統寫實手法進行創作，他們盡力描寫澳門的人和事，是想要在流浪中融入澳門本土文化中去，在澳門找到自己的歸屬，這種情感的歸屬需要建築在身份認同上”。^①然而，在澳門經歷的跨文化經驗中，澳門作家逐漸在精神放逐的焦慮與不安中尋找到精神歸屬與身份認同。作者在對華洋雜處、多元混融的敘述中，體現出其對澳門殖民文化內部的實質性的把握，以及對澳門本土文化主體性的逐步認同。

黃萬華從其建構的台灣文學史，香港、澳門文學史，和海外華文文學史的“三史”思維中，提出了“旅外”和“在地”這兩種華文文學的基本形態概念。他認為，由作家構成的文化遷徙群體“都將自身原先擁有的文化資源‘旅外’遷移至現時文化空間，以‘在地’的方式與原先的在地文化相遇、對話、交融，產生華文文學關係的變動性、開放性”，並認為，“‘旅外’和‘在地’兩者之間包括轉化在內的變動往往成為各地華文文學形成自身傳統的過程，既反映出中華文化傳統播傳中的新變，也呈現出中華文化接納各區域華文文學得以豐富的樣貌”。^②黃萬華分別從“在地”、“旅外”二者與華文文學的整體建構、中華文化的精神內蘊以及跨語言書寫三個方面進行論述，以此觀照澳門文學研究，可以更加明晰地看到研究者們可以如何對澳門文學內涵的深化及外延進行的拓展，同時也體現了“文化間性”的運轉原理——“所謂‘在地’是就華文文學與所在地關係而言，它往往是‘將自己置身他者之間’，落實於所在地‘本土’之中；而‘旅外’則就華文文學與離開地關係而言，前述文化遷徙群體都可視為其出發地的‘旅外’群體”。的確，一個地方的旅外文學實為另一個地方的在地文學，一國一地的華文文學往往也包括在地文學和旅外文學兩種成份，這中間並非簡單的並置關係，也非純粹的從屬關係，而是一種文化異質成份相互滲透、相互影響的複雜狀態。

三、從媒介關注到澳門文學的交互性拓展

自2012年澳門葡文報紙《句號報》(*Ponto Final*)創辦第一屆澳門文學節以來，澳門文學在這一年一度的文學節中逐步釋放活力。2016年3月4日至19日，長達半月之久的第五屆澳門

① 周小蘭：《澳門小說中的流浪與歸屬情結——以20世紀80、90年代小說文本為例》，《華文文學》(汕頭)2016年第2期。

② 黃萬華：《在地和旅外：從“三史”看華文文學和中華文化》，《廣東社會科學》(廣州)2016年第6期。

文學節在澳門舊法院大樓舉行。此次文學節依舊延續往屆“雋文不朽”的主題，號稱“全球首個讓中國和葡語系國家進行文學藝術交流的盛會”，^①在此期間，各小說家、詩人、出版人、翻譯家、音樂人、電影人等來自世界各地的文化界知名人士紛紛出現，相聚於澳門這座小城，共同對這裏的文學、文化進行交流和研討。值得一提的是，此次文學節首次分別向中國和葡萄牙的兩位文學大家——湯顯祖和詩人庇山耶(Camilo Pessanha)致敬，在中國與葡萄牙的跨時空對話中，飽含着濃厚的文化間際意味。2016年是明代戲曲家湯顯祖逝世的400週年，他曾於1591年到訪澳門，被視為“第一位在澳門與外國人接觸的中國作家”，又留下了敘寫澳門的幾首作品，讓澳門“在他的作品中獲得另一種永生”；^②此外，此次文學節亦向另一位土生葡人作家庇山耶致敬，這位生於澳門，逝世於澳門的葡萄牙詩人，留下了包括詩集《滴漏》(Clepsidra)在內的大量佳作，受到幾代澳門文學研究者的關注。由此看來，文學節的設定是為東西方文化兩端的杰出人物提供對話的機會，不僅如此，在活動期間，主辦方還邀請國內外知名的視覺藝術家、電影人及音樂人，通過“作家座談、工作坊、音樂會，以及走進校園交流等活動，帶來各地精彩作品，共享文學與藝術盛會”。^③在多元化的展出內容及形式面前，我們不難看出主辦方對文學傳播方式的關懷，每年一度的順利舉辦也透露出澳門人意欲通過藝術表達、影視等一系列媒介的帶動能力，促進文學本體發展的迫切願望。重視傳播媒介與文學本體之間的互動關係的理念，除了從文學節運轉機制的不斷成熟中可以看到外，在其他文學獎項、本土期刊等方面亦有顯著體現。

不僅有澳門文學節，“澳門文學獎”這個獎項也已在澳門成功舉辦了十一屆，每兩年舉辦一次，涉及的獎項按照文體劃分為小說、散文、現代詩歌和戲劇四個組別，“澳門文學獎”是澳門最具權威性的文學獎項(由澳門筆會、澳門基金會合辦)。效仿於“香港文學雙年獎”的成功機制，“澳門文學獎”立足本土，面向世界，得到來自文學界乃至整個社會越來越多的認同，參賽作品的數量與質量也逐步提升，足見澳門文學日趨活躍的氛圍。澳門文學和與之相關的活動及獎項互為拓展，共同促進本土文學的生態發展，創造了良好的交互氛圍。

文學獎的設立以及文學節的舉辦均以活動形式為澳門文學創造了的“活血”的機會，但是文學發展的內部要通過“造血”尋求真正的生存動力。伊江客(許均銓)介紹了當下澳門文學幾份重要刊物，^④作為活躍於澳門文壇的緬甸華人中生代作家，他敏銳地感知到傳播澳門文學所依托的媒介及其重要性。對《澳門筆匯》、《澳門寫作學刊》、《澳門作家文集》、《故事／原創小說》(季刊)和《澳門中華詩詞》等純文學刊物的來源、主編、刊出時間、總期數以及主要內容作出介紹。雖然澳門很多文學刊物的壽命並不長，但是從不斷有新的刊物湧出這一情況來看，澳門文學期刊所代表的澳門文學生命力仍相當頑強。

其實，澳門文壇不乏年輕作家，作品層出不窮，亦有本地年輕作家跨越地界，於外地出版個人作品。例如依靠商業出版的專業推廣方式出版《救贖》而獲取好評的小說家紫寧，2016年又

① 《第五屆澳門文學節揭幕》，《澳門日報》(澳門)2016年3月6日第A03版。

② 《第五屆澳門文學節揭幕》，《澳門日報》(澳門)2016年3月6日第A03版。

③ 《第五屆澳門文學節揭幕》，《澳門日報》(澳門)2016年3月6日第A03版。

④ 許均銓：《淺談澳門文學刊物》，《紅豆》(南寧)2016年第9期。

在香港出版長篇小說《Killers 弒》，這部懸疑偵探小說因為題材新穎，敘述別致，又綜合了目前各種流行文學的元素和傳播方式，相當符合年輕讀者的審美趣味，因此受到青年人的追捧；來自澳門本地“別有天詩社”的四位成員於同年在台灣出版個人詩集，有邢悅的《日子過得空白一點也不錯》、洛書的《燕燕於飛》、譚俊瑩的《我喜歡我是現在的樣子》和雪堇的《香水的餘地》，他們用嶄新的作品形態向世人展示澳門文學新生力量所帶來的新氣象。該詩社早前在網絡上十分活躍，證明了傳播媒介對澳門文學重要的助推作用，以作品的成就說明澳門文學的實力，又在台灣舉行新書發行活動，更是以實際行動向外推廣澳門文學。寂然曾表示：“新一代的作家顯然各具視野，他們重視的，不單純是一份官方資助的出版經費，他們更在意作品以甚麼方式推出，可以發行到甚麼地方，能在多少間書店與讀者見面。”^①從重視內容、到內容與形式並重，可見澳門文學的新生力量對文學載體形式的掌控力度。由於澳門文學作品在澳門本地的發行力度十分有限，因此在如何提高作品“能見度”方面，年輕作家頗有自己的見解。“看見前輩的書慘遭冷待，他們有理由擺脫既有的運作模式，自資出版也好，跨海出書也罷，圖的是一個較為完善的發行網絡，畢竟，自己的書能在誠品、博客來公開發售，感覺絕對比擺放在本澳門某大書店的陰暗角落好一萬倍”。^②澳門新晉作家對新媒體的接納度很高，能夠懂得讓文學的精神內核搭載媒介的外在傳播方式，加上他們對於文學本身有不同程度的解讀方式，於是讓文學融入澳門文化這個大範疇中，就有了更為豐富的互動形式。

再說出版方面，2016年底澳門基金會與作家出版社、中華文學基金會聯合推出的“澳門文學叢書”第三輯終於亮相，可謂澳門文學界一大要事。這套叢書對澳門文學的重要性絲毫不亞於同年出版的《香港文學大系1919—1949》之於香港文學的重要性。這是繼2014年第一輯、2015年第二輯出版之後，澳門文壇老、中、青三代作家又一次在內地的群體演出。“這套叢書小說、詩歌、散文、評論諸體皆備，生活能見度清晰，情感傾向性鮮明，皇皇56部著作，洋洋千餘萬言，以一塊與澳門人息息相關的靈魂高地，展示了澳門文學在堅定的文化自信中穩步前行的實績”。^③李觀鼎表示，澳門言論自由的氛圍一向是本地人引以為榮的。因此，從澳門文學中流露出的文化自信，中和了文藝商品化對文學純粹性的影響。“它尊重資本，但不屑於當金錢的奴僕，它冀望暢銷，卻不肯為此而媚俗；它拒絕靈魂的降解，在精神貶值處張揚精神價值；它拒絕消費主義慫恿，於物慾中堅守文學本真”。^④如此道出了澳門文學獨有的溫度，該叢書記載了1986—2016年這30年來澳門文學場景的變化，也在其中埋藏了純真、樸實的情感。自2012年啓動“澳門文學叢書”項目以來，短短的幾年已經出版了三輯，是澳門文學發展水平和實力的一次集中展示，無論從數量還是質量上來看，均體現了澳門文學的活力，而在內地出版的形式同時也具有“讓澳門文學走出澳門”的文學傳播意義。

① 寂然：《改善澳門文學的能見度》，《澳門日報》（澳門）2016年8月24日第E05版。

② 寂然：《改善澳門文學的能見度》，《澳門日報》（澳門）2016年8月24日第E05版。

③ 李觀鼎：《“澳門文學叢書”第三輯出版：在堅定的文化自信中穩步前行》，《文藝報》（北京）2017年1月4日第6版。

④ 李觀鼎：《“澳門文學叢書”第三輯出版：在堅定的文化自信中穩步前行》，《文藝報》（北京）2017年1月4日第6版。

詩歌、小說和散文創作均有向多種媒介（如網絡）借力的現象，而日益崛起的文學評論更是抓住了各類文學活動的交流平台，充分挖掘資源。戲劇方面找到了文學與其他藝術形式跨界發展的機會，使之得到新生。例如，史詩京劇《鏡海魂》，是由澳門女作家穆欣欣擔任編劇，講述澳門一百多年前的一段真實的歷史事件。這是澳門首次與內地劇團以這種形式進行的深度合作，由江蘇省演藝集團京劇院與澳門基金會共同完成，曾經在內地多個城市和澳門巡演，這部為澳門量身打造的歷史大系“充滿澳門元素”，觀眾除了可以看到大三巴牌坊、葡國盾徽界碑石、蓮峰官廟、聖安多尼教堂等標誌性極強的澳門城市景觀外，還能有一睹“澳門醉龍”這種澳門傳統特色的民間表演項目。從澳門到內地，從歷史故事到京劇表演，從平面劇本到立體舞台，《鏡海魂》的成功跨越了文學與藝術的界限，得到了澳門及內地觀眾的喜愛。

由此可見，彈丸之地並非沒有文學種子播撒，雖然這座城市商業氣息濃厚，多數情況下掩蓋了它的文學氣息，但是在文學作品內容與傳播媒介（刊物、出版、網站、活動、公共展示空間）的創新方式有機結合之下，從單純的媒介關注走向常態化的交互運作模式，這種借助商業成熟的環境發展自身的方式無疑是澳門文學特殊的生長路徑。將文學的內外部要素不斷拓展，巧妙地連接，形成了其獨特的文學生態。在這樣的生態系統中，文學、文化與產業之間模糊了邊界並相互融合，從發展主題到文化格局，澳門文學始終顯示着澳門人不屈服於現狀，努力攀登高峰的正能量。澳門的文化境遇複雜，但從未出現真正的斷裂，從近幾年的本土文學發展的趨勢來看，澳門文學正在進入平穩發展的時期，文學形態或許有所改變，但其中一貫飽含的精神內蘊始終長存。

[責任編輯 陳超敏]